

515/360

刘静夫 著

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人民出版社

本卷提要

本书介绍的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两汉和隋唐两个大统一时期中间的一个分裂、战争的时代。在社会动乱、战争频仍、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艰难。在这种社会动荡的环境下,由于某些地区某个时期实行了一些经济上的改革和调整,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又由于战乱中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从未间断,因此这个时期的商业表现得十分活跃。

本书分三个部分介绍了这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分别介绍了三国两晋经济的逐步恢复、十六国北朝经济的曲折发展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状况。

目 录

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一、魏晋南北朝经济概述	1
二、三国两晋经济的逐步恢复	5
(一) 汉末北方经济的大破坏	5
1. 户口的大量耗减	6
2. 汉末农业的大破坏	10
3. 城市和工商业的破坏	11
(二) 魏国地区经济的初步恢复	12
1. 屯田制的实施	13
2. 州郡农业的发展	20
3. 曹魏农业经济的恢复	21
4. 曹魏的手工业和商业	23
(三) 吴蜀地区经济的初步恢复	25
1. 蜀汉的经济	25
2. 吴国对江南的开发	30
(四) 西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42
1. 统一全国前的西晋经济	42
2. “户调式”	46
3. 西晋后期经济的大破坏	53
三、十六国北朝经济的曲折发展	58
(一) 十六国时期的北方经济	58
1. 十六国时期政局的演变	58

2. 战乱下的北方坞堡经济	61
3. 十六国前期诸国的经济	65
4. 十六国后期诸国的经济	70
(二) 北魏前期经济的缓慢进步	74
1. 鲜卑拓跋部的兴起	74
2. 统一北方过程中的掠夺经济	76
3. “离散诸部,分土定居”	78
4. 北魏前期农业的初步发展	80
5. “牛马驼羊、色别谷量”	86
(三) 均田制的实行和北魏后期的农业	89
1. 孝文帝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	89
2. 均田、三长、租调制的制定和实施	92
3. 北魏后期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97
(四) 北魏的手工业和商业	103
1. 北魏的工商机构和工商地位的逐渐改善	103
2. 纺织、矿冶和冶盐业的发展	106
3. 城市的复兴和对外贸易	111
(五) 齐、周对立时期的北方经济	117
1. 北魏末期的经济大破坏	117
2. 东魏北齐经济的盛衰	118
3. 西魏北周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22
四、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开发	131
(一) 步履艰难的东晋经济	131
1. 北方流民南下与侨州郡县的设置	131
2. 给客制度与“括户”	134
3. “土断”	135
4. 东晋经济的艰难起步	139

(二)南朝的农业和南方的开发	142
1.发展的趋势和概况	142
2.土地经营与农业生产	145
3.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提高	158
4.南方开发的概貌	162
(三)东晋南朝的手工业	169
1.工官和工匠	169
2.手工业发展概况	172
(四)东晋南朝的商业	181
1.市场、商品和商税	181
2.各色人等的商业活动	189
3.互市贸易和对外贸易	194
4.货币	196
(五)人民的沉重赋役负担	200
1.南朝赋役制度的演变	200
2.各种名目下的巧取豪夺	203
3.沉重的徭役	208
4.政府的检籍和“符伍制度”	211
五、结 语	215

一、魏晋南北朝经济概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两个大一统时期中间的一个分裂、战争的时代。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户口繁息，垦田增加，整个社会经济有了较迅速的发展。人口最盛时近 6000 万，垦田最多时达到 800 余万顷。在战国的基础上，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有了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手工业和工艺品的制造，日益丰富、精美。国家虽然重本抑末，但因国家统一，交通便利，“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船车贩贾，周于四方”，商业也相当活跃。但是，两汉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最发达的是以两汉都城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其次是巴蜀和淮北，再次是淮南、汉水流域和长江下游以南的丹阳、吴、会等地。东汉中期以后，长江流域人口增加，前、后汉比较，扬州由 302 万增至 433 万，荆州由 336 万增至 626 万，益州由 454 万增至 724 万。南方虽在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北方，但南方进一步开发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

与两汉经济增长相伴而来是地主势力的膨胀。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田宅、奴婢、徒附，而且还有强大的社会势力和私家武装。他们是汉末分裂的种子。黄巾大起义动摇了东汉的统治，早已分裂的东汉统治集团，便由政治斗争发展为军事斗争，又进而演变成魏、蜀、吴三国鼎立。此后，直到公元 589 年隋灭陈统一中国，

除了西晋有 30 余年(公元 280—316 年)的统一外,国家一直处于分裂和战争之中。这就是说,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是在完全不同于两汉时的环境下发展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民族矛盾上升,战争的破坏,使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艰难。特别是汉末和西晋末年的两次全国性大动乱,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因此,怎样进一步开发尚待发展的南方经济,恢复受到惨重破坏的北方经济,是当时统治者面临的一大课题。这一基本课题及其相关的具体问题解决的程度,决定着各个封建王朝经济成就的优劣。也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其独特的风貌。

(一)两汉时期,土地兼并和与之相伴的小农破产沦为奴婢、流民,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魏晋以后,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地广人稀,土地已不再是主要问题,劳动力的不足已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为此,国家与国家、政府与世俗或僧侣地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人口的斗争。各国之间不断地相互虏掠、迁徙人口。各国内部,政府一面实行赐客、复客、荫客、荫亲属、送故、给干力、佛图户、僧祇户等制度,满足世俗或僧侣地主的部分要求,以巩固其政权的阶级基础;一面又千方百计地控制、扩大编户,采取括户、土断、检籍、强化符伍制度、立长校户等措施,禁止、限制豪强对人口的无限制占有。利用国有荒地,实施屯田、占田、均田制度和与之配套的租调制,使农民有田可耕,负担也可以承受,以保证对劳动力的控制。而世族豪强也毫不让步,与国家针锋相对,或隐占、或豪夺、或巧取、或公开反抗,力图保持对人口的占有。由对土地的争夺,转向对劳动力的控制,是本期经济的一大特点。

(二)战乱引起的人口大规模迁徙,使当时的经济格局也发

生了变化。由于大量人口向东北、西北、巴蜀和江、淮以南转移，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北方经过反复的破坏之后，逐渐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先后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在经过由畜牧到农业，由不熟悉农业到熟悉农业，由早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以后，北方经济得到了恢复和较迅速的发展。这种人员、技术、信息的多相交流，打破了两汉时期关中、中原先进，四周越远越落后的经济格局，使其向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三)在分裂动乱、经济残破环境下发展经济，更需要改革创新精神，需要不断解决新问题。因此，此期南北双方经济上的小调整不断，大的改革也时有出现。这些调整、改革的重点，集中在控制户口，使民有田可耕，调整农民负担，保证国家收入，放免奴婢、杂户，放宽对工、商的限制等问题上。在这些方面，北方实行的措施深入、有力；南方除土断外，则显得表面、零碎、无力。这大概是北方终于能灭掉南方的经济原因。

(四)伴随着民族斗争、民族融合而出现的少数民族定居农业化、封建化，是此期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在南方，这种变化往往是由军事征服和政治高压面实现的，如东吴的征山越、蜀汉征南中、南朝及魏周时征诸蛮，均属此类。而在北方，入主中原的胡族统治者多半是自觉地接受封建的汉族文化。典型的如北魏的孝文帝、北周的文帝、武帝，他们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为后世提供了崭新的经济模式。

(五)此期的另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是商业的畸形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衰落，布帛、粮食等实物货币盛行。但这并不等于商业的衰退。实际上，在战乱中，南北之间的和平交往，包括经济、文化往来，从未间断过。各封建王朝对水陆交通的重视、南

北贵族们对财富和奢侈品的追求,都为商业的发展、活跃创造了条件。由于政治腐败、官商勾结,更为商业的畸形繁荣提供了动力。这一时期,南方的海外贸易,北方对西域的贸易,都不逊于前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残酷的时代;是人民苦难最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是最能显示人民力量的时代。在十六国时期,历史似乎走上了绝路;但经济仍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其具体表现就是生产力的社会代表——生产者通过各种斗争,或在生产斗争领域中进行新的创造,或迫使政治上层建筑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干脆摧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权。他们的努力,也使保护生产力的政权得以生存、巩固、发展。劳苦大众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是历史的真正主宰。

二、三国两晋经济的逐步恢复

(一) 汉末北方经济的大破坏

东汉后期,政治一片黑暗。宦官外戚轮流擅权。他们不仅相互倾轧,卖官鬻爵,滥兴刑狱,而且还利用权力疯狂兼并土地,并将沉重的租赋徭役转嫁到百姓头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使作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日趋破产,部分丧失了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实际上,在黄巾起义前,东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已遭到很大的破坏。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在镇压黄巾大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相互征讨,形成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瘟疫横行,东汉社会经济由隐性破坏变得明朗化。在这场持续几十年的规模空前的巨大浩劫中,全国各地社会经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其中,北方经济所受破坏尤为惨烈。人口锐减、宫阙破败,农田荒芜,工匠逃匿,饿殍载道,尸横遍野。古老的北方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1. 户口的大量耗减

汉末是一个分裂和战争的时期。当时，战争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战争；另一类是割据一方的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征战。让我们先看第一类。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军在北方7州28郡同时俱起。张角、张梁、张宝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主力同皇甫嵩激战，兵败阵亡者近20万人；皇甫嵩、朱儁击败颍川黄巾军，仅斩首者便不下13万人；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公孙瓒袭击青、徐州地区的黄巾军，屠杀义军6万人以上，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江河。这里记载的只是官兵杀死起义者的一部分，而在双方进行殊死大搏斗时，官兵的死亡也不会少。大战以后，“千里无人烟，无鸡鸣犬吠之声”。这些被大量屠杀的，原本是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直接生产者，他们被大量杀害，致使社会生产力所受破坏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军阀间的战争给无辜百姓造成的灾难，更是不可胜言。军阀战争残害百姓，一是战场上的互相斩杀，二是杀害无辜百姓。前者如董卓死后（公元192年），部下李傕、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①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袁绍部将麴（qū，音曲）义破公孙瓒于鲍丘（今河北省渔阳县），“斩首二万级”。^② 陶谦和曹操作战，陶谦兵败而逃，“死者数万。”^③ 袁绍与曹操决战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境内）时，袁绍军队溃败，曹操将投降的袁军士兵数万人全部活埋。这是军阀相残的人口减耗。无辜百姓在军阀屠刀下丧生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董卓入洛阳以后，曾派军到阳城（今河南登封县），正赶上百姓聚在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

③ 《三国志》卷八《陶谦传》。

一起举行春季祭社活动。卓军便诈称这些人要造反，于是把男子全部砍头，将妇女和财物全部抢走，回到洛阳，声称破贼大胜。董卓西迁长安时，将洛阳人口数百万悉数胁迫随行，“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董卓死前，其部将李傕等在中牟战胜朱儁(jùn, 同俊)，乘势抢掠陈留、颍川各县，“杀掠男女，所过无复遗类。”^①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再攻陶谦，下取虑、睢陵、夏丘等五县后，把无辜民众全部杀掉。正是由于这些军阀们滥杀无辜，才造成了到处烟火断绝，杳无人迹的荒凉景象。

战争往往伴随着天灾和疾疫。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已不注重生产和抗灾；而人口的大量死亡又是疾疫流行的温床。汉末，自黄巾起义以后，小的、局部的天灾几乎年年都有。其中，重大灾害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发生的蝗灾和旱灾。史书记载说：这一年，蝗虫起，百姓大饥。“三辅(关中)大旱，谷一斛五十万，人相食，白骨堆积”。曹操与吕布争兖州，因“军食尽”，想投靠袁绍，后听程昱建议乃止。次年(公元195年)七月，汉献帝自长安东归。十二月，渡过黄河至安邑(今山西夏县)。因为这一年又发生了旱灾和蝗灾，所以仍然“无谷”，随从官吏靠食枣、菜活命。仅有的一点粮食，也因“诸将不能相率”，被抢吃光。献帝曾采取拜坞主为官的办法，希望能得到他们赠一点食品，刻官印供不应求，使用锥子画一画，表示有文字就算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汉献帝到了洛阳，随从官吏依然没有粮吃，尚书郎以下皆亲自采野稻充饥。曹操到洛阳迎接汉献帝，“所将千余人，皆无粮”；到了新郑(今河南郑州)，杨沛将收藏的千余斛干桑椹献给曹操，以救一时之急。^② 由此可见，自兴平元年到建安元年的三年严重的自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② 《三国志》卷十五《杨沛传》。

然灾害,等于给当时的战乱经济雪上加霜。

瘟疫的流行,是造成经济破坏的又一个因素。据记载,汉魏之际,大疫共有三次。一次是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大概与统治阶级残酷屠杀黄巾军有关。第二次是建安(公元196—220年)中,张仲景为长沙太守时,大疫流行,宗亲死者甚众,百姓得伤寒死者十之七。这成了他编撰医学名著《伤寒论》的一个契机。第三次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这一年,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瑒、刘桢皆染疫而亡。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①说的就是这次大疾疫。大疫降临,往往造成“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甚者全家死光,“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②连逃亡躲避也来不及。可谓一人染疾,一家俱亡;一家染疾,一族俱伤,只有坐以待毙。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战争、灾荒、疫疾是造成汉末中国,尤其是北方人口锐减的最主要的原因,它们对经济的严重破坏,确如晋人山简所综述的那样,从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的30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③。

除了直接死于兵燹、灾荒、疾疫之外,北方人民为了逃避天灾人祸,大量流移逃奔他乡,流向相对安全的区域。在汉末三国之初,民户流徙方向及区域有三:一是由关中、中原流入长江上游的巴蜀以及中游的荆襄地带。史载:刘璋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今四川)数万家”^④又“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

①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

② 《后汉书》卷十七《五行志》注。

③ 《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附山简传》。

④ 《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引《英雄记》。

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① 二是由中原流入东北或渡海依公孙度于辽东。史载，国渊、邴原、管宁、王烈等均避难辽东；袁绍据河北时，逃入乌丸、鲜卑的汉人也不少；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为扫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征三郡乌丸，大破之于白狼山，“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② 其中，一部分就是流入乌丸的汉人。三是由中原流徙入江、淮间。青、徐、兖、豫及淮北人民大都先避难淮南，继而再渡江，散居江东。三路流民中以这一路为最多，故亦屡见记载。史载，孙策占有扬州以后，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③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欲北徙江淮间十余万户，结果弄巧成拙，这些人均渡长江进入吴境。《三国志·吴书》列传中有名的吴臣约60人，其中，来自中原者约占半数。至于普通群众及依附于士人流徙江南的则难以统计。如，鲁肃便是由淮、泗间率其部众“男女三百余人”^④ 避乱江东。可以想见，随他人流徙江南者必不在少数。

战争、天灾、疾疫造成的人口的大量死亡，加上人口的四散流徙，使北方人口骤减。西汉平帝元始年间，有户12233062，有口59594978，这是西汉户口的最高记录。东汉桓帝永寿年间，有户10677960，有口56486856，这是东汉户口的最高记录。及至西晋灭吴以后，总计不过有户2459804，有口16163863。而且，这是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统一南北后的数字，是经过三国半个世纪恢复后的数字。三国时期户口数字，自然比这要少。故史言当时天下户口减耗，十存其一，这是曹操已败袁氏以后的估计。

① 《三国志》卷二十一《卫覬传》。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③ 《三国志》卷十三《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

④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注引《吴书》。

到曹丕称帝以后,蒋济和陈群在上疏中都说到当时户口“不过汉时一大郡”。^①对这些议论,朱大渭同志经过考察后认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②在战乱频繁的地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在当时人的诗文中也有反映。王粲在《七哀》中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在《蒿里行》中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对当时现实的写照。

2. 汉末农业的大破坏

汉魏之际,由于战争、天灾、疾疫和流移逃散,北方的人口骤减。农业生产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土地荒芜,粮食匮乏,粮价高涨和人的饥馑死亡。洛阳附近是“树木成林”,河内地区一片荒凉,至晋初,仅此一郡即垦荒五千余顷。所谓“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③的现象十分普遍。淮河南北,“不居者各数百里。”^④

与土地荒芜相伴而来的,是粮食的匮乏和粮价的高涨。董卓时,“谷一斛至数十万”。汉献帝兴平元年,三辅“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⑤“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旱蝗之灾,人始知采稻(lǚ,音吕,野稻),以桑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⑥伴随粮荒的是饥馑和死亡。袁绍军在河北,靠桑椹充饥;袁术军在淮南,以蒲赢(蚌蛤)果腹。“江淮间空尽,人相

① 《三国志》卷十四《蒋济传》,卷二十二《陈群传》。

② 《魏晋南北朝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见《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③ 《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

④ 《三国志》卷五十一《孙韶传》。

⑤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⑥ 《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王粲《英雄记》。

食。”曹操在兖州，逢兴平元年大旱，蝗灾，“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以至新招募的吏兵，因为没有粮食供给而罢遣。荆州本富庶之区，经过战争，“荆州荒残，人物殆尽。”从这些简单的记录可以看出：东部，起黄河以北的幽、冀，南至江淮；西部，北起关中，南至荆、襄，到处是饥荒，甚至人吃人也屡见不鲜，反映出长江以北的发达的农业区如今都是满目荒凉了。

3. 城市和工商业的破坏

三辅、三河地区，素以经济发达闻名天下，两汉的都城洛阳、长安和中原的若干大城市，均位于这一地区。然而，在东汉末年这场浩劫中，它们却首当其冲。史载，董卓西迁长安时，命令他的部下将洛阳城周围二百里之内烧掠一空。他自己则亲自带队把洛阳城内南北宫、宗庙、府库、民家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城内扫地殄尽。”^① 故而，当汉献帝由长安落难逃回洛阳时，昔日繁华的洛阳城只剩下断壁残垣；曾错落有致、宽阔通达的大街已掩埋于一片杂草、瓦砾之下。三辅地区及其政治、经济中心长安城，所受破坏也一样严重。董卓死后，其部下李傕、郭汜争权混战，死尸枕积，“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病、弱）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② 咸阳萧条，人无以衣食，吃酸枣、野菜，穿从坟中掘出的衣服以蔽体。素以“天府之国”著称于世的关中地区顿时变成面目全非的一片荒土。河北的邺城，算是破坏较轻的，但人口稀少，经过曹操父子的苦心经营，才略有起色。徐州原本“百姓殷盛，谷食甚丰”，经过曹操的几次屠杀，许多县城成了空城。汉末仲长统在《昌言·理乱》中说：自春秋以后，天下愈乱，

① 《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及注引班彪《续汉书》。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破坏愈甚,东汉末年的大破坏所造成的是所在“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①充分概括了当时城乡一片荒凉景象。城市手工业由于城市之破坏而陷于停顿。在锋镝(di,音滴)之下侥幸活下来的工匠们,或随流民四下逃散,或被一些军阀集团所控制。当时,矿业几乎陷于停顿。铁成为稀罕的材料,原来用以铡断罪人左右脚的铁刑具,这时都换成木制的。不但是铁,连铜也几乎停止开采。魏国曾经一度废除钱币,以谷物交易。这主要是由于商品生产萎缩,不需要钱币,但铜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史称,刘备曾“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②我们知道蜀地本身是产铜之区,西汉赐给邓通的铜山即在蜀。此时假使产铜丰富,刘备的帐钩就没有销毁的必要。由于农业、手工业破坏严重,商业、商品经济自然更谈不上。货币基本上停止流通,有些交易也多以谷帛为媒介。市场虽未断绝,但萧条冷落。魏初文帝至南阳,以“市不丰乐”拘捕了太守杨俊。

总之,从黄巾起义到三国初年的三十几年间,中国北方经济——包括关中、中原和淮北,在战火、饥荒、瘟疫的交相侵袭之下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民流散,烟火断绝,呈现一片萧条景象。而巴蜀、江南凭依高山、大江之险,经济所受的破坏要轻些。南北经济的这种不同,是三国鼎立的物质基础。三国立国后,针对不同的经济形势,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促进各自经济的恢复。

(二)魏国地区经济的初步恢复

^① 《全后汉文》卷八十八。

^② 《南齐书》卷二十八《崔祖思传》。